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茶业开发

樊汇川,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安徽 合肥 230026)

[摘要]作为茶树发源地的我国西南地区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近代海通以后,东南各省茶业迅速发展,但西南各省茶区却由于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制约,始终维持着较低的产量。1938年后,由于华东茶区的沦陷,国民政府急需增加茶叶产量以满足易货贸易所需。经济部遂下令由其下属的中茶公司主导开发西南五省茶业。中茶公司先后对川、康、黔、滇、桂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并从设立制茶工厂、试验茶场、茶叶银行等方面推进西南地区茶业发展。这次茶业开发是我国西南地区茶业的重要转折点,使西南茶业从此开始逐步提升,并使西南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产茶区域,也是在抗战后方开发背景下,茶业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结合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抗日战争;西南地区;中茶公司;茶业开发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3.011

中国西南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川、滇、黔各省均有着悠久的产茶历史。早在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就对西南各地茶产做了详细的记述,如“剑南以彭州上,绵县、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又如“黔中生思州、费州、播州、夷州”等。^[1]到明清两代,西南各地更是名茶迭出。如明代顾元庆所辑《茶谱》记载:“茶之产于天下多矣,若剑南有蒙顶石花……邛州有火井思安,渠江有薄片,巴东有真香”。^[2]

近代海上茶叶贸易兴盛以后,东南各省茶业发展迅猛。但西南地区因“远居边陲、交通不便、音讯难通”,茶叶产量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国民政府工商部曾对1915年至1929年共14年

间全国各省茶叶种植情况进行过统计,以这14年间的年均种植面积为例:四川327188亩,广西77899亩,贵州1645亩;而同期江西省1267935亩,安徽750119亩。^[3]可见直至民国中期,西南各省的植茶规模仍远逊于东南茶区。

此后,亦曾有个别西南地方官员试图借鉴东南茶区的经验发展西南茶业,例如1932年四川省政府就曾专门派员赴皖、浙考察,学习制茶技术和运销经验,作为发展川茶的参考。^[4]但这种零星的举措并未能产生较大的影响。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东南茶区的沦陷,国民政府出于增加茶叶生产换取外汇的考虑,对西南各省茶业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这次茶业开发

作者简介:樊汇川(1989—),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博士研究生;石云里(196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涉及川、滇、黔、桂、康五省,民国大部分的茶叶专家都参与其中,是抗战时期后方农业开发的重要部分,也是近代西南各省茶业由弱到强的拐点。

目前学界有关抗战期间中国茶业的研究多集中在茶业的统制政策和中茶公司经营状况等相关问题上,而对这次“举全国之力”的茶业开发尚缺乏关注,因此有必要作为专题做进一步研究。^[5]本文依据相关的民国档案和期刊文献,重点分析西南茶区的开发背景、开发过程、开发成效等方面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后续影响。

一、开发背景:易货贸易、难民垦殖与以茶替烟

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出于增强对经济的控制并促进出口创汇的目的,先后通过全国经济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等部门对棉、钨、锑、桐油、猪鬃等大宗出口商品实行统制政策。^[6]茶叶作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亦被国民政府列入其统制计划之中。1936年,国民政府首先从外销红茶入手,设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在皖赣两省的红茶产区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该委员会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长和皖赣两省政府财政、建设厅长五人任常务委员,并设总运销处于上海,所有安徽、江西所产之红茶均由该处统一销售。^[7]翌年5月,实业部又联合各省建设厅成立了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China Tea Co., Ltd.,以下简称中茶公司),由实业部次长周贻春任董事长,寿景伟任总经理。中茶公司负责替国民政府对茶业进行统制,各地茶区所产茶叶均由中茶公司收购,内销和出口也都由中茶公司统一负责。^[8]

中茶公司成立以后,积极拓展茶叶外销,为国民政府换得了大量的外汇。以1937年为例,对苏联茶叶出口总值达国币2878000元,在对苏联贸易的各类商品中居首位;对英茶叶出口总值达国币5188000元,在当年对英出口商品中仅次于蛋品和矿砂,居第三位。^[9]但好景不长,1938年后随着战局的失利,华东诸省接连沦陷。东部各地茶区或沦入敌手,或濒临前线。大部分茶区的

生产趋于停滞,少数勉强维持生产的地区所产茶叶也因交通中断难以运出。而战事紧急导致各地征调壮丁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也使得尚未沦陷地区的茶叶生产受到影响。此外,随着日本占领区域的不断扩大,日方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抢夺茶叶资源。根据当时军事委员会转交给经济部的情报显示,日方一面着手对沦陷区茶业实行统制,一面派出人员向相邻的国统区私购茶叶。^[10]由于日方茶叶收购价普遍高于国统区售价,这种由国统区向沦陷区的茶叶走私一度十分盛行,以至于后来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甚至提出由各地政府主动组织向日占区销售茶叶的建议。^[11]上述种种情形加剧了国民政府茶叶收购的困难,尤其在1939年对苏、英两国的易货条约签订之后,茶叶供给不足导致的交付困难令国民政府急需扩大茶叶生产来维持易货贸易,以换取必要的战争物资。^[12]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尽力维持尚未沦陷的东部茶区生产之外,在远离前线的西南省份进行茶业开发,增加茶叶产量促进出口成为当时必然的选择。

事实上,除了增加茶叶产量的直接目的,国民政府对于开发西南茶区亦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首先,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难民内迁,如何安置这些难民成为后方省份日常社会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据1938年中国红十字会的统计,随着战线转移而迁往内地的难民超过一千万人。^[13]为解决难民的生计问题,中央救济委员会于1938年10月颁布了《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要求各省划出供难民开垦的荒区并设立专门管理难民移垦事务的垦务委员会。^[14]因此,这时在西南各省发展茶业恰好可以为部分难民提供解决生计的新途径。当时在垦殖工作中提倡种茶的农学专家亦不在少数,例如国民政府的垦殖工作顾问、农学家唐启宇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做战时垦殖工作专题演讲时就将茶叶作为后方垦殖工作中首推的经济作物。^[15]

其次,自清末以后,西南各省由于自然环境上的适宜以及受到地方军阀支持等因素的影响,

罌粟种植泛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决心在全国范围肃清烟毒。1935年国民政府成立了禁烟工作委员会,并制定了《六年禁烟计划》,敦促各地分期逐步完成对烟毒的禁绝,其中尤其强调了西南地区禁烟形势的严峻。^[16]但单纯的惩罚措施并不能有效地禁绝罌粟种植,国民政府意识到只有在原本种植罌粟的区域推广可行的替代作物,才能更为彻底地实现禁烟目标。1939年6月3日,蒋介石在纪念虎门销烟一百周年讲话时又明确要求西南各省建设厅必须在推行禁烟政策的同时,指导农民种植相应的替代作物。^[17]实际上,当时的茶界专家也意识到推广植茶与禁烟之间的关系。例如1939年中茶公司总经理寿景伟撰文论述西南经济开发时就强调:“使从前滇黔诸省原种鸦片之地,改种茶叶,藉为澈底祛除烟毒之根本计划。”^[18]后来茶学家张天福在1940年给经济部递交的关于进一步发展西南五省茶业的建议中也阐明:“西南各省,本为产茶之区,且荒田原野,宜茶之地,又复比比皆是。且自烟禁之后,农村生产,亟待抵补,正可广事种植,以资救济。”^[19]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部希望通过中茶公司主导开发西南茶区,在增加茶叶生产的同时,实现赈济难民和“以茶替烟”的目标,可谓一石三鸟。

二、前期调查与开发计划的制定

开发西南茶区的计划始于1938年7月湖北羊楼峒茶业试验场场长徐方干向经济部递交的一份关于开发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茶业的报告。当时正值武汉会战爆发不久,羊楼峒等主要的青茶产区告急。徐方干出于补充茶叶生产以维持对外贸易的考虑,提出开发西南茶区的建议。徐在报告中细致地分析了川、黔、滇三省的气候、土质、地形以及茶产分布等情况,认为西南各省的茶业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能,政府应该分步进行茶业调查、建设制茶工厂并设立茶叶试验站,促进植茶以增加茶叶出口,换取物资支持抗战。

报告递交后不久得到了经济部长翁文灏的认可。经济部随即令饬中茶公司对西南各省茶业现状进行系统调查,评估开发所需资金,拟具开发计划。同时,由翁文灏部长致电川、黔、滇、桂四省主席,请求四省政府对茶业调查及后续开发的相关事宜给予必要的协助。^[20]

1938年末至1939年初,中茶公司先后派出业务处专员郑鹤春、刘轸,技师冯绍裘、戴啸洲、范和钧,技士张石城等专家分赴川、滇、桂、黔、康五省,对西南各地的茶业状况、茶树品种、地理交通情况进行调研并拟写开发计划。^[21]数月后,所派专家先后完成对各省的考察并将调查所得写成报告提交中茶公司,中茶公司基于这些调查报告制定了西南茶业开发的计划草案。笔者在中茶公司提交给经济部的《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二十八年度事业进行计划》中查到这份计划草案,其中对各地茶业的状况和后续发展规划做了详细的论述。^[22]

戴啸洲等人对四川茶业状况分析之后认为:四川产茶以边茶为主,不适宜大规模改制外销红茶。但四川所产边茶原本是砖茶的一种,通过技术上的改进,可以制造出口砖茶,对于弥补湖北羊楼峒失陷后造成的对苏联砖茶出口方面的产能困难具有重要意义。建议中茶公司与四川省建设厅合组四川茶叶改进委员会,并在灌县(今都江堰市)设立砖茶制造厂,制造砖茶以维系中苏砖茶贸易。此外,报告认为川东的北碚与南川金佛山两处茶种优良、交通便利,具备垦殖大规模示范茶园的条件。建议在北碚西山坪设实验茶场一所,在南川金佛山设分场一所,所需开发及设备采购经费拟为国币八万元。^[23]

冯绍裘等人对云南各茶区调查后认为:适宜在宜良、顺宁(今临沧市凤庆县)、佛海(今西双版纳自治州勐海县)等处开辟实验茶区。建议先从宜良着手,筹设宜良实验茶场附设示范茶厂;之后在顺宁筹设实验茶厂改制外销红茶并在佛海设厂制造砖茶及外销红茶。建议以制造砖茶五万箱、外销红茶一万二千箱、内销绿茶两千箱

及改良内销普洱茶五千担为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冯在赴滇调查期间还于佛海发现了新茶种(即云南大叶种茶树),并利用该品种试制滇红,所制红茶经中英两国技师审评,认为其品质完全可以与印锡优质红茶媲美。^[24]

郑鹤春等人对广西茶业进行调查后认为:广西产茶区域以桂林、灵川、恭城、贺县、苍梧、藤县、岑溪、上林、横县等地为主。根据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别,可初步分设五大实验茶区:第一处拟设桂林,利用沿桂江水道、公路及湘桂铁路等处交通路线可获运输之便。第二区拟设横县,沿郁江水道西通桂西滇东,南通粤西可出海。第三区拟设上林,但上林地处桂西,交通颇为不便。第四区拟设贺县,沿公路可通苍梧。第五区拟设苍梧,苍梧为水陆交通交汇之处,为桂省出口重心,在此建厂最为适宜。上述五区,建议先行试办横县一处,其开办及设备费亦以国币两万元为限。至其余桂林、上林、贺县、苍梧四处或因交通不便,或以临近战区均拟暂缓办理。^[25]

刘铨等人对贵州茶业调查后,认为当地茶产品品质优,但数量较少且茶区分布较为散漫。主要以安顺、石阡两地产茶较多。而交通则以安顺最为便利。计划在安顺设立第一实验茶厂,改制外销红茶,在石阡设第二实验茶厂制造内销绿茶。其余如贞丰、黄平、都匀、镇远等处以择适中地点配设示范茶场。建议先在安顺设立实验茶场,其购地建筑设备等费计国币五万元。石阡实验茶厂拟俟第二期再行设立。^[26]

此外,中茶公司还对西康茶业进行了考察。西康原本是藏销茶的主要供给地,20世纪以后因印度茶商向藏区的倾销茶叶,康茶在藏区原有的垄断地位遭到挑战。此后,红军长征路过西康,激烈的战事又使得原本处于萧条中的西康茶业雪上加霜。中茶公司经过调查后,认为恢复西康茶业不仅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增强内地与藏区的联系也至关重要。因此计划与贸易委员会及西康建设厅合组西康茶业改进委员会,拟在雅安设立实验茶场,并与当地茶商领袖共同

筹设西康边茶贸易公司。考虑到西康当地的制茶方法陈旧,建议以训练技术员工为第一步。雅安实验茶场开办费与设备费及技术员工之训练费拟以五万元为度。^[27]

在这份开发计划的最后,中茶公司对五省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云南茶区最广,茶质最佳,应当作为开发的重点。此外,四川、西康两省由于砖茶和边茶的特殊性,亦具备较大的开发价值。而相比之下广西和贵州两省较弱,可待未来条件成熟做进一步开发。

三、西南各省茶业的开发进程

由于战事紧急,国民政府对完成易货贸易条约换取物资的需求十分迫切。因此,中茶公司对西南茶业开发的实施进程未有丝毫的耽误。事实上,在委派专家赴各地开展茶业调查的同时,中茶公司总经理寿景伟也先后拜会了云南、四川、西康等省当局,商谈茶业开发的相关事宜。^[28]

当时,中茶公司在开发西南茶区的问题上主要面临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西南各地茶叶产量较低,倘若仅依靠当地茶农和茶商,短时间内提高产量几无可能。另一方面,就制茶技术水平而言,当时西南各地亦难以与东南茶区相比,尤其是不具备改制外销红、绿茶的技术基础。因此,在西南茶区开发的初期,中茶公司将设立新式机械制茶厂作为其首要的工作。事实上,中茶公司自成立以后,便一直积极推动机械制茶技术的普及。为了促进制茶技术的革新,中茶公司甚至不惜以每年国币两万元的高薪聘请英国制茶专家韦纯(E. P. Witham)作为技术顾问分赴各地协助新式制茶厂的建设工作。^[29]中茶公司于1937年末至1938年初先后建立了恩施实验茶厂、皖西实验茶厂等新式制茶工厂。故在开发西南茶区之初,中茶公司对于新式制茶厂建设方面已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此外,除了建设新式制茶工厂,中茶公司为推进当地茶叶科研和加强对农户植茶改进示范,还在西南茶业开发时设立了

一些科研和示范双重功能的茶业试验站和以及为茶农提供贷款的茶叶银行等机构。

五省之中最先付诸行动的是云南省。由于采取合作开发的模式,中茶公司的提议很快便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积极回应。1938年12月5日,中茶公司总经理寿景伟与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缪嘉铭商定双方各出股本国币10万元,成立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中茶公司)。不同于一般以牟利为主要目的的私营公司,该公司将开发云南省茶业作为主旨。^[30]在其后的几年里,由于业务发展以及受战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影响,云南中茶公司又被双方多次增资。增资后总股本达240万元,其中富滇新银行占股国币170万元,中茶公司占股国币70万元。^[31]

公司成立后不久便着手在云南境内建设制茶工厂。1939年由冯绍裘赴顺宁筹建顺宁茶厂,3月开建,10月建成;1940年佛海茶厂在范和钧的主持下建成投产;同年9月复兴茶厂建成投产,10月宜良茶厂建成投产。1941年春,云南中茶公司又与康藏商人代表格桑泽仁订立合约,各出资15万元,在昆明下关成立康藏茶厂,制造藏销紧茶。^[32]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云南中茶公司共建立4座自营茶厂和1座合营茶厂,其中以佛海和顺宁两厂规模最大,设备最为齐全。^[33]

四川省的茶业开发进程紧随其后。1939年10月,中茶公司在四川灌县设立灌县实验茶厂,戴啸洲任厂长。该厂以生产对苏易货贸易所需砖茶为主,制茶工人共计49人,另有管理和技术人员21人。制茶工人多为由东部省份产茶区内迁的茶工,技术人员均接受过农学教育。^[34]随后不久又在安县(今绵阳市安州区)设立安县制茶厂。除灌县、安县所在的川西茶区之外,四川东部的南川一带亦是重要茶区。在中茶公司前期调查方案中原计划在南川也设立制茶厂,但由于种种原因,南川的茶业开发最终由四川当地茶商投资进行。就在中茶公司建设灌县茶厂的同一时间,由重庆利群公司和金佛山垦区合资创办的

金佛茶叶公司成立。该公司负责南川及周边地区茶业的开发建设,由张澍霖任总经理。^[35]公司总部设于重庆,在南川设立制茶厂三座;由重庆利群公司负责技术人员招募,而茶厂的制造和人事管理则由金佛山移垦区办事处负责。^[36]

如前文所述,当时西南五省中茶叶资源以云南和四川最为集中。因此在实际开发建设的过程中,亦是以川、滇两省为主。相比之下西康、广西、贵州三省的开发力度则略显薄弱。

西康原属四川省,“二刘争川”之后刘文辉败退雅安,便开始谋划西康单独设省自立。1938年秋,中茶公司派员赴西康地区考察时,提议与当地茶商合组中茶公司西康分公司并设立实验茶厂,但由于当地政府的暗中抵制,该提议未能得到康藏茶商们的响应。1939年1月1日,西康正式建省之后,刘文辉便着手绕开中茶公司,独自统制康藏茶业。据刘文辉在其回忆录中记述,当时西康省的财政捉襟见肘,急待开源,鸦片和茶叶成为他拓展财税收入的重要来源。^[37]在刘的委派下,夏仲远等人募资一百万元,于1939年6月1日成立了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38]该公司在雅安下设制茶厂6座,于天全设制茶厂2座,并在雅安分公司设立技术室,以罗健为技术主任。^[39]康藏茶叶公司成立后,对西康茶业实行统制政策,西康省府要求当地所有茶商以入股形式并入康藏茶叶公司旗下,并严禁私自卖茶入藏。

广西的茶业开发进程则更为迟缓。在开发的前期,中茶公司在广西仅设立一个运销处,负责出口茶叶的运销工作。直到1941年,中茶公司与广西省建设厅合办的广西实验茶厂才建成投产。该厂位于贺州八步,由陈时皋任厂长,设计年产能五千担。此后又在贺县狮洞和苍梧县六堡,分设示范茶场。^[40]

如前文所述,贵州境内产茶地较为分散,因此在西南茶区开发之初,中茶公司并没有在贵州建设制茶厂。但1939年,国立浙江大学几经辗转西迁至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后,中茶公司出于发

展西南茶叶科研的目的,又决定联合中央农业实验所、国立浙江大学在湄潭共同成立了中央实验茶场。中央实验茶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大学参与建设的茶叶科研机构。建场时张天福主持场务,后由浙大农学院的昆虫学家刘淦芝教授任场长。该场有试验茶园 200 余亩,研究内容涉及茶树病虫害、茶种调查、制茶学等方面。^[41]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机械制茶厂和茶叶试验场的建设之外,西南茶业开发中还建立了专营茶叶贷款的茶业银行。云南中茶公司原本大股东便是富滇新银行。为了鼓励农民植茶,富滇新银行又与中茶公司合作设立了富滇茶叶银行,资本六十万元,专门经营茶叶贷款业务。^[42]富滇茶叶银行与安徽茶叶银行、浙江茶叶银行等近代第一批茶叶银行成为抗战期间促进茶业振兴的重要金融力量。

四、茶业开发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

自 1938 年开始,由中茶公司主导、各省政府参与的西南茶业的开发工作历经 4 年有余,至 1942 年底基本完成。这次大后方的茶业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短短不到 5 年的时间里,通过制茶工厂、茶叶银行以及茶叶科研机构的建设,较为彻底地改变了西南各省茶业原本落后闭塞的状况。但另一方面,这次茶业开发也存在诸如产能未达到预定目标以及开发过程中与边民冲突等问题。

(一) 开发成效

首先,此次西南茶区开发最直接的成果是为当时的中国建成了一批新式制茶工厂,促进了华茶生产由传统模式向近代化的过渡。近代印度和锡兰茶业崛起主要有赖于机械制茶对茶叶品质的提升和制茶成本的降低。而近代华茶衰落,则因长期受制于农户手工制茶的种种弊端。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曾专门提出:“在国际发展计划中,吾意当于产茶区域,设立制茶新式工场,以机器替代手工,而生产费可大减,品质亦可改良。”^[43]近代茶学家吴觉农与范和钧在

合著的《中国茶业问题》一书中也指出华茶改良的首要任务便是采用机器替代手工,以提高茶叶品质,降低成本。^[44]抗战期间西南茶业开发过程中,中茶公司在各地先后设立了十余座新式制茶工厂。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顺宁茶厂,共有机械揉茶机 6 台,手摇揉茶机 27 台,烘茶机 6 台,筛分机 10 台,另有动力引擎 2 台,发电机 1 台,各种制茶器具大小共计 970 件,设备体系完整。^[45]这些制茶工厂不仅在当时改变了西南各省茶业的状况,也成为 1949 年以后西南各省茶业持续发展并向现代化过渡的中坚力量。

其次,在这一过程中,各省对于制茶技术做了诸多的创新和推广。当时最主要的困难在于外国制茶机械价格高,且订货周期过长一时半会无法投入使用,因此设计简易的木质制茶机器成为当时主要的努力方向。例如 1939 年,冯绍裘就带领中茶公司技术人员设计多款木质揉茶机和烘茶机,由当地取材,请木匠按照设计图纸制作。又如贵州湄潭的中央实验茶场为了解决动力燃料短缺的问题,发明了畜力和机械动力两用的揉捻机。其创新之处是将三台揉捻机组合在一起,中间共用一个转盘,并利用耕牛等牲口拉动转盘提供动力。^[46]此外,为了提高茶叶品质,中茶公司还积极向当地的茶农进行技术推广。当时西南各地茶农技术守旧且单一,并不熟悉外销红茶的制法,中茶公司下属的制茶厂在生产之余,专门开设培训班,对周边茶农进行培训。半日讲授红茶初制方法,半日实习,一切费用由厂方负担。至培训结束时,已有茶农开始将初制的红茶售卖厂方,其中不乏品性优异者。^[47]

(二) 存在的问题

从茶业开发的实际结果来看,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产能未达到预期以及开发过程中与边民所产生的矛盾两方面。

首先,产能未达到预期是这次茶业开发最大的问题。到 1942 年底,中茶公司在西南各省共建成大小制茶工厂十余座,但每年产茶量仍与东部茶区相差甚远。以云南中茶公司 1939 至 1941

年统计资料为例,这三年中以1940年产量最多,也仅有14635.18担。该数字尚不及东部茶区战前一县的年产量,如著名外销红茶产区祁门县1934年产茶量便高达17982担。^[48]所以在1941后,中茶公司转而又重新加大了对皖南、浙西、闽北等尚未沦陷的东部茶区的投入,以谋求茶叶产量的增加。

造成产能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茶业人才的不足导致中茶公司所建的制茶厂无法实现预想的生产规模。如1939年,云南中茶公司以15-18元(高出当地工资3元以上)的月薪招募熟练制茶工人,但招来的工人无论勤劳程度还是技术熟练程度均难符合要求。^[49]无奈之下又通过振济委员会拨专款10万元,在江西修水县招募优良茶工一百名,由汤挺生领队,赴滇支援。其间还发生了因修水县政府未得到省府明令不准百名茶工出境的情况,后复由经济部长翁文灏致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始得放行。^[50]此外,不仅制茶工人缺乏,技术、营销和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因此,1940年中茶公司为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又决定与复旦大学合作设立茶业组及茶业专修科,共同培养茶叶技术和经营方面的专业人才。^[51]

此外,战时的物资短缺也严重制约了茶厂产能。由于各类物资优先保障前线抗战所需,后方面临严重的物资断供,这使得当时西南各地的茶业开发进程难以按照计划进行。据郑鹤春回忆,云南各茶厂在设计之初均配备柴油引擎,但随着战事发展,柴油逐渐断供。于是只得另向贵阳的中国机器制造厂订制以木炭为燃料的引擎勉强替代。^[52]此外,在各厂建设过程中,建材的短缺亦成为制约因素。据冯绍裘撰文描述,在筹建顺宁茶厂时由于无法批量买到建材,只能一砖一木零星收购,导致建设工作缓慢。第一年所产几百箱红茶均系在临时搭建棚屋中进行。^[53]至于各类制茶机器设备和配件的短缺以及道路不通造成的困难就更不必多说。

除了产能不足之外,这次西南茶区开发所遇

到另一个问题便是与边民的矛盾。由于西南各地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在风俗习惯以及行业规范上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而此次茶业开发时实行的统制政策让当地茶商的业务受到较严重的影响,结果导致了一些与边民的利益冲突并引起边民的反抗。其中较为显著的两次冲突分别发生在西康和云南。

如前文所述,以刘文辉为首的西康当局一直谋求对康藏茶业的统制。早在1938年9月,西康银行经理陈锡长便利用大量资本收买当地茶商的存茶贮藏于仓库,此举又导致当地大茶商囤积居奇,于是藏销茶的价格由原来的每秤70元开始快速涨价。1939年6月,康藏茶叶公司成立后,开始对当地茶叶全面统制。茶商无论资本多少,均只能按照原有茶引配额折算入股。当时康藏茶叶公司认为茶对于藏民属于刚需,便肆意抬价,到6月涨至每秤120元。8月以后,又因藏洋价格下跌,藏销茶价格涨至每秤200元。^[54]

康藏茶叶公司的统制行为引发了藏族茶商的强烈抗议。1939年8月中旬,昌都、玉树、德格、甘孜、理化等地藏商集体罢市并向西康省政府请愿,提出四项要求:(1)撤销康藏茶叶公司,恢复自由营业;(2)维持法币与藏洋的原有固定比值;(3)每秤茶定价70元;(4)不得再对茶叶之外的其他商品实行统制;此举使得西康省当局深感压力,代主席张为炯认为西康省政治形势原本已较为严峻,如不能妥善处理,茶叶统制恐会引起更多问题。于是对康藏茶叶公司施压,同时请理化的大喇嘛火竹香根出面调解。最终双方妥协,规定藏销茶价格固定为一秤藏银五十两,法币为140元。1942年以后,面对藏销茶叶的进一步下滑,刘文辉又签署命令取消内销茶平衡费并允许自由买卖。^[55]

另一次影响较大的冲突事件发生在1941年的佛海茶厂。当时佛海茶厂厂长范和钧因在收购茶叶过程中与边民沟通不当,导致茶厂与边民之间发生冲突。佛海当地茶商洪记、时利和及土司刀宗汉等人随即向云南省政府控诉范和钧滥

用职权,扰乱市场。中茶公司对此事的最初反应是认为该事件属于个别狡诈边民对范和钧的诬告。但后由云南省建设厅责令当地政府多次调查,认定洪记、刀宗汉等人举报情况大致属实,调查结论书认为:“范和钧个性偏执,处事过严,未能入境问俗、俯顺輿情与民合作,遂至引起种种纠纷。并建议中茶公司将范和钧调离佛海,易人接任。否则当地民怨日深,公私两受影响。”^[56]

五、结 语

抗战时期,由于东部发达地区的各种工业丢失殆尽,国家不得不在经济基础薄弱,交通不便的后方省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以维系国民经济和供应抗战所需。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在外贸中占比逐年下降的茶叶、桐油、猪鬃等农产品又重新成为国家出口换取物资和外汇的主要商品。

自1938年秋至1942年末不足5年的时间里,以中茶公司为主,各省地方力量参与的这次西南茶业开发正是大后方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这些业界先贤们在交通不便、资源短缺甚至还会遭到日军空袭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极力为维护战时国民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1942年,日军攻入缅甸,原本依赖滇缅公路的茶叶外销受到极大的影响。此后,只能改由驼峰航线向印度空运以及由西北陆路向苏联运送,但运量受到较大限制。因此,1942年以后西南各省的茶业开发工作亦逐步陷入停滞。^[57]

总体来看,这次茶业开发成功地改变了我国西南茶区的落后状况,使西南各省茶业迎来近代第一次快速发展,并开始逐步形成现代化的茶业体系。但毕竟受到战时各种条件的制约,其建设成效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在茶业开发之初宣称可以起到以茶替烟的作用,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替代作用十分有限。西南各地鸦片种植背后有着十分复杂的利益关系,并非简单地利用替代作物的推广可以改变。

此外,长期以来,作为国有垄断企业的中茶

公司在史学界因低效运营和内部贪腐而饱受批判。但在这次茶业开发过程中,却明显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私营企业的特点——即始终以国家利益为主而非单纯地强调盈利。中茶公司在完成其经济职能的同时,也扮演着落实国家政策,执行国家意志的角色。其对茶叶科研机构和复旦茶叶系建设的资助更是为中国茶叶科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最后,这次西南茶业开发由当时全国半数以上的茶学专家参与其中。这些专家此前已在各省茶业改良场担任场长、技师多年,对于华茶生产技术的革新和茶叶科学的研究积累颇深。因此,这次茶业开发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南京十年期间中国茶叶科技相关探索的第一次大规模产业化检验。而最终西南各地制茶厂建设的技术规格和茶叶质量,也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南京十年茶叶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成就。

注释:

[1] 吴觉农:《茶经述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注:明清多个版本《茶经》将“思州”写为“恩州”,经吴觉农先生考证应为思州。

[2] [明]顾元庆:《茶谱》,[明]喻政:《茶书》,万历41年(1613)喻政自序刊本。

[3] [日]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中华民国茶业史》,《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第九十五辑》,昭和6年,第50页。

[4] 刘孝先:《调查浙江安徽两省茶业报告书》,《四川省建设公报》1932年第1卷第5期。

[5] 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农业开发、茶叶生产及中茶公司在抗战期间的经营活动的研究已具有一些成果,但对于抗战时期西南地区茶业开发尚未有专题研究。代表性成果有苏鑫鸿:《抗日战争时期安溪茶叶生产的几个侧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吴伟荣:《论抗战期间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郑会欣:《从官商合办到国家垄断——中国茶叶公司的成立及经营活动》,《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王景琪:《灌县直属实验茶厂研究(1939-1944)》,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6] 郑会欣:《战前“统制经济”学说的讨论及其实践》,《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7] 《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章程》,《经济旬刊》1936年第6卷第11期。

[8] 郑会欣:《从官商合办到国家垄断——中国茶叶公司的

成立及经营活动》，《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

[9][18]寿景伟：《对外贸易问题与西南经济建设》，《财政评论》1939年第1卷第3期。

[10]《军事委员会抄送敌谋劫夺中国长江流域茶叶情报及商讨对策案》，1939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27001。

[11]《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电询皖南茶叶销路滞塞可否准运敌区的文书》，1940年6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26301。

[12]孔祥熙：《抗战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与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工作概况》，《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2卷第23期。

[13]《中振会移殖难民垦发西南》，《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救济月刊》1938年第1卷第7期。

[14]《中央法规：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云南省政府公报》1938年第10卷第103期。

[15]唐启宇：《战时垦殖问题》，《四川农业》1937年第3卷第2期。

[16]《禁烟总会规定各省市六年禁烟程序》，《中央周报》1936年第406期。

[17]《总裁指示肃清烟毒工作三要点》，《政工通讯》1939年第5-6期。

[19]龙云：《云南省政府指令：秘建字第738号》，《云南省政府公报》1940年第12卷第3期。

[20]《徐方干拟开发川黔滇省茶叶意见书及有关文书》，1938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12535。笔者注：此时距西康建省尚有半年，故当时翁在向各省主席提出合作建议的名单中并不包含西康省。

[21][24][46]寿景伟：《我国西南新茶区之开发及其进展》，《茶叶丛刊》1939年第一卷。

[22][23][25][26][27][28]《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二十八年度事业进行计划》，1939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29483。

[29]《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韦纯顾问薪金结算案》，1939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16796。

[30][32][33][45][52]郑鹤春：《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概况》，《西南实业通讯》1942年第6卷第2期。

[31]1939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主要财税来源的丧失以及战争开支的增长，国统区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法币加速贬值。因此，经营预算无法赶上物价上涨，通过追加股本的方式增资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有关当时国统区通胀和经济恶化的详细研究参见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1939-1949)》，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34]王景琪：《灌县直属实验茶厂研究(1939-1944)》，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35]张澍霖：《金佛茶叶公司南川茶厂制茶概况与南川茶叶改进之意见(一)》，《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3卷第1期。

[36]张澍霖：《金佛茶叶公司南川茶厂制茶概况与南川茶叶改进之意见(续完)》，《西南实业通讯》1941年第3卷第2期。

[37]刘文辉：《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三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63年，第1-58页。

[38]《西康省建设厅拟与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成立雅安茶叶改良场案》，193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26355。

[39]《康藏公司改良茶品》，《康导月刊》1940年第3卷第2-3期。

[40]《桂实验茶厂精茶上市》，《农业院讯》1941年第2卷第21期。

[41]《涪潭茶场研究概况》，《农报》1945年第10卷第19-27期。

[42]《中茶公司在西南各省开辟新产茶区——公司资本增至一千万，并在西南设立茶叶银行》，《大美周报》1940年第43期。

[43]孙文：《建国方略》，上海：民智书局，1924年。

[44]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47][49][53]冯绍裘：《顺宁实验茶厂第一年办理经过》，《闽茶季刊》1941年第1卷第2期。

[48]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调查编纂：《祁门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第15页。

[50]《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呈送滇茶产销概况及改进办法并拟组云南中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文书》，1939年3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35568。

[51]寿景伟：《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呈报与复旦大学合办茶业系及茶业专修科案》，1940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60705。

[54]《康藏商人反抗省银行边茶公司统制茶叶并提高藏洋价格文书》，1939年1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26388。

[55]刘文辉、李万华：《省财税字第0216号(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发)》，《西康省政府公报》1942年第93期。

[56]《云南佛海茶商洪记呈诉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佛海茶厂厂长范和钧假公营私的文书》，1941年1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经济部档案(四)26470。

[57]庄晚芳：《当前中国茶业危机之成因及其对策》，《闽茶》1946年第1卷第7期。

[责任编辑：陶婷婷]